

社会学与社会发展丛书

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

李友梅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 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李友梅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1

(社会学与社会发展丛书/邓伟志, 沈关宝主编)

ISBN 7-81058-268-2

I . 组... II . 李... III . 组织社会学-研究
IV . 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111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200072)

常熟市印刷八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 字数：250 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定价：18.50 元

社会学与社会发展丛书编委会

主 编：邓伟志

沈关宝

副主编：胡申生

仇立平

张钟汝

总序

邓伟志

自邓小平提出社会学在中国“需要赶快补课”以后，上海大学文学学院的前身——复旦大学分校便于 1980 年 3 月在国内率先设置了社会学系，并且同时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社会学刊物——《社会》，随后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以及若干个研究中心。20 年来，社会学系的教师、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以及《社会》杂志的编辑，三方面共同结合，呕心沥血，编写了不少教材。有的教材为多所学校采用，有的教材很受学生欢迎。教材是教学的蓝图。教材是学生成长的阶梯。教材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酵母。现在中国许多省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校友，有的校友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学生今日之高素质不能不认为同昨日之好教材有一定的正比例关系。

可是，随着光阴的流逝，再好的教材也有过时的地方。现在已经到了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的最后几个月。手再伸得长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与 21 世纪握手了。时间老人已经拿起大锤，准备去敲响 21 世纪的大钟了。

在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将有长足的进展。在 21 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将更加繁荣，更加规范。在 21 世纪，多种所有制之间的构成将出现新的格局。经济的这些变化必然要作用于社会。何况经济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呐！

在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会变得更加匀称，更加合理；中国的社会变迁将更加迅速，更加有序。这些都需要我们社会学界用世纪眼光去观察，去审视，都需要我们在社会学教材中加以反映和提炼。社会

学只有聚焦时代、反映时代的义务，没有漠视时代、脱离时代的权利。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我们编写教材的工作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进程将大跨度地向前推进。社会学的学说、学派将层出不穷。包括那些在 20 世纪里未能引人注目的某些社会学观点，在 21 世纪说不定会在课堂上成为主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约为 110 余个。可是，据中国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 140 余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所有这些，恰是我们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同仁学习和借鉴的对象，恰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重要参考资料。

时代在呼唤新教材。实践在鞭策我们不断开拓进取，编出新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大家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边编写，边讲课，边听取意见，边修改。至于说是否做到了人们常说的“全新”，我们不敢妄言，似乎也无此奢望。我们只是在求新，未必做到全新。渴望同行多多给予指点，因为我们还要继续编写，继续出版，继续奋斗。

教材的编写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000 年 6 月 10 日
于上海大学 A 楼 601 室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组织的复杂化与工业化	(9)
一、大工业组织的发展	(9)
1. 动因之一:引导或影响变化趋势	(10)
2. 动因之二:保留或重建自主空间	(16)
二、组织作用的发现	(30)
1. 组织:个体实施其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31)
2. 组织:工业社会可动员的基本单位	(33)
3. 组织:调整关系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39)
三、组织研究的演进	(45)
1.“手”的超越与劳动科学组织原理	(46)
2.“心”与人际关系学说	(52)
3.“头”与决策分析	(61)
第二章 组织社会学的成长历程	(77)
一、从组织生活的具体问题出发	(77)
1. 科层制现象的理论之争	(79)
重视现代科层制的理性化形式	(82)
强调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	(86)
2. 相关的经验研究	(88)
案例 1:工业企业领导方式的变化	(89)
案例 2:公共机构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	(92)

案例 3:围绕两个公共部门里的规则组建的游戏	(94)
二、从形式组织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98)
1. 组织与社会体系	(99)
2. 组织解析的复杂化	(105)
3. 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118)
第三章 组织决策推论的基本要素	(124)
一、组织内的个体行为特征:决策	(125)
1. 行动者出场的逻辑	(125)
2. 相关的经验研究	(131)
案例 1: 生产流水线工人的行为方式	(131)
案例 2: 会计事务所职员的行为方式	(133)
3. 行动者的自由余地	(136)
二、权力关系:不确定性领域	(142)
1. 权力及其来源	(143)
2. 权力与组织	(156)
3. 相关的经验研究	(162)
案例:工业垄断集团生产车间的权力结构	(162)
4. 组织结构和游戏规则	(170)
三、组织的边际:中继者的概念	(175)
1. “社会职能”与“环境”	(176)
2. 相关的经验研究	(182)
案例:省政府与其环境的关系特征	(182)
3. 环境对组织的直接影响	(190)
四、组织的调节:实际行动体系	(195)
1. 体系制约的行动	(196)
2. 行动者创建的体系	(204)
第四章 组织分析的另一些思考	(210)
一、组织方式的维持	(212)
1. 组织的潜功能	(212)
2. 相关的经验研究	(216)

案例：法国式的官僚作风	(216)
二、组织中的决定、参与和变化	(222)
1. 决定如同体系现象	(223)
2. 参与如同解决问题的方法	(225)
3. 变化如同一种集体学习	(230)
第五章 步入“组织田野”的研究步骤	(234)
一、研究者初始阶段的位置及其变换	(235)
二、探索性调查研究的展开	(239)
三、问题的解释和假设检验	(244)

引言

科学是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答案，它总是依赖于它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总体的发展状态。“科学最初是与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类型的社会中，科学才能兴旺和发达，反之，没有科学之持续的和旺盛的发展与应用，这样一种社会也不能正常地运行。”^①这种关联在社会学领域更为突出，因为社会学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各种社会群体在社会演变中碰到的不明确的和难以解释的问题。^②社会学研究者从自己的实践经验里得知社会现实的本质构造比我们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能够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其实，社会学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方法，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更容易受到既定社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组织社会学也不例外，它在近 70 多年中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清楚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集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同时也印证了组织社会学是在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中发现了与自己同步成长的身影：现代社会中的组织现象的日益增长，而与此密切关联的正是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实施其战略决策的各种手段的变化。组织社会学也正是在对现代社会中迅速繁多的组织现象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

① T·帕森斯著，《社会科学：一种基本的国家资源》，未发表的手稿，1949（转引自巴伯著，顾昕等译，《科学与社会秩序》，第 71—72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② E Friedberg, L analyse sociologique des organisations, revue POUR, №28 red 1973, p 11

同时,形成了属于其自身的分析逻辑并建立了这个分析逻辑的合法性。

组织现象始于一种合作:个体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的共同目标而必须使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达成的合作。基于这种合作的群体必须以分工形式确立任务,而且要有协调不同任务的措施和执行这些措施的制度保证。其实,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当人们着手办理某事时总会感到有组织和安排人员的必要,于是,组织成了人们进行集体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换言之,这一手段的运用可以使那些为了实现已定共同目标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与一定的秩序相适应。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管其愿意与否,多少都会从属于一些组织(比如一个个体既是企业的工程师,又是其职业工会的会员、某体育协会的成员、某政党的党员等)。组织无所不在,并以多种方式运作,而且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广泛的领域。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学家才会感到有必要去观察、分析组织是怎么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之际,组织概念开始受到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大工业企业经济方面的发展、国家官僚机构在政策上的发展。此时,对大规模增长的企业组织在形式上理性化的需求,正碰到了工程师的唯科学主义意愿和一种社会学思考的深入。20 世纪初的 30 年中出现了许多关于企业劳动组织、企业行政职能以及公共行政机构的权力等方面的重要管理思想,其中最为出名的有 F·泰罗(F. W. Taylor)的劳动科学组织、H·法约尔(H. Fayol)的企业行政职能、M·韦伯(M. Weber)的理想型科层制行政领导。他们这些思想的共同点在于试图通过严格规则在组织中进行整顿。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一种新的思潮,即以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为研究范围的学派开始露出。这个学派的研究成果在 50 年代里相继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E·梅奥(E. Mayo)关于组织中个体和非正式群体行为的看法。由此导致了研究人类动机复杂性的极大兴趣,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比如 A·马斯洛(A.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和 D·麦格雷戈(D. McGregor)关于寻求组织目标和不同行动者目标之间更好调解的观点。K·利维(K. Lewin)等社会学家在 30 年代末开始的关于社会影响、权威和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结论:就群体的效力

而言，民主型胜过于放任自由型或自治型。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去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领导型在这些情境里产生效力，而在另一些情境里却不发生效力。^①换种方式说，人们更加注重对企业中的“人类范围”给出定义，把注意力集中到组织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进而展开了针对组织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来源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引发了对韦伯科层理论的深刻反思。

T·帕森斯(T. Parsons)1951年发表了他的专著《社会体系》^②，他在其中强调指出，每个社会体系都可从组成该体系的不同代理的行动为出发点来加以理解。体系概念从此逐渐在有组织行动的分析中受到重视。C·巴纳德(C. I. Barnard)早些时就曾经指出组织的成员是处在一个事先确定好的结构里的，^③换言之，组织构成了体系。这里的组织和行动的概念被曾经在40年代提出过行动者有限理性概念的J·马尔什(J. G. March)和H·西蒙(H. A. Simon)再次使用^④，他们阐述了在既定情境中的行动者无法选择出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可以根据他们掌握信息的程度和实际行动的能力作出令人满意的选择。

60年代以后，组织现象的深入研究在法国特别受到了社会学家的重视。M·克罗齐耶(M. Crozier)著的《官僚主义现象》^⑤以及他与E·费埃德贝格(E. Friedberg)合著的《行动者与体系》^⑥表明了他们为了试图超越“有限理性”理论和确立“决策分析”的方法而希望构建一种行动理论。在这种理论里，行动者支配着一定的自由余地，并在既定情境里发展一种理性。每个行动者都有必要制定其个人的决策，这种决策行为的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影响力，其思想方式取决于他的价值标准、他对形

^①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 Un siècle de réflexion sur les organisations, *Sciences Humaines-Hors série*, №20, 1998, p. 6 - 8.

^② 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③ C. I. Barnard, *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④ J. G. March, H. A. Simon,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trad. fr. *Les Organisations*, Paris Dunod, 1965).

^⑤ M. Crozier, *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3.

^⑥ M. Crozier, E. Friedberg, *L'acteur et le systè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7.

势的领悟和他掌握的势力手段。克罗齐耶和费埃德贝格指出，在人类关系和社会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权力关系。费埃德贝格在其《权力与规则》^①的论著中将决策分析扩展到所有集体行动形式，他特别强调的是组织这个术语既表示一种状态又表示一种动力。

人们不难看出，组织社会学家对于组织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研究逐渐形成的。同时，人们也可以发现，随着工业化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组织的特征不断被再造，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组织特征的日益复杂化其实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越来越多的问题或活动离开私人领域而变成“社会化的”，或者说，问题解决或活动组织的责任越来越由专门机构以集体方式承担了。工业社会以前，个人的受教育属于其家庭方面的责任，而工业化的发展使这个责任逐渐转移到全民集体方面，由于这种转移，组织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组织随着其自身的变化也更加复杂化了。实际上，组织为了适应社会对它们要求的增加而趋于多样化，或者说，组织为了满足社会对它们的要求，就必须使自己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教育机构要想在人类活动快速社会化的情况下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实现自身的目地，就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单一教学大纲，它们不仅要更新教育内容，而且要使教育内容更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的不同公众（青年人或成年人，执行者或领导者，农民或市民等）从它们那里得到满意。

回顾组织研究的发展过程，社会学家最早发现的组织是具有一定结构并有规定角色的组织，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试图完全限制其成员行动自由的组织。随后，社会学家注意到组织并不是中立的，它如同一种过滤器，有可能让某些创新的行为通过，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没有完全限制住其成员的行动自由。不过，人们此时对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进行的分析，仍然习惯于借助心理学的术语（如个性、情感等），或者根据阶级划分的条件（如社会来源、社会结构等）来推论。这种不足的发现所引起的反思性研究使组织社会学家进而提出：如果研究能够深入到某个中介层，那么就有可能再掌握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也是限制组织成员

^① E. Friedberg, *Le pouvoir et la règ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3.

行动自由的重要因素。其实,一方面,组织倾向于尽可能精确地规定每个成员的任务、职位、特权及其应该作出的贡献,这些规定使个体很难扩展自己的行动范围,因而只能克制他的创造性。另一方面,组织以其特有的调节方式和非中立的评判标准支配着能迫使其不同等级层的成员接受一种富有灵活性的逻辑,结果造成了能够影响其成员的关系、决策和行动方向的社会体系。

尽管组织具有如此的制约特征,一些坚信大企业的快速发展如同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思想家们依然为这些大企业的因循守旧、例行公事、步调统一、无个性等问题感到震惊。因此,出现了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思潮,比如“组织的人”、“灰色的人”、“大众社会”等观点被提出来。人们看到的是大企业的权力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精英的手里,即“管理学家”和大组织上层的“高级专家”将不断替代每个成员对国家事务的民主参与。以夸张的语言来分析这种看法,最终结果是个体及其自由意志会在无个性的规则世界里迅速消失,社会将在官僚主义模子里构造而趋于均质。

事实上,由于个体从来不只属于一个组织,他在其社会生活中有多种责任和多个效忠,他的行为因此难以只限于服从一个组织的制约。个体可以在多处承担角色(比如企业的工程师、工会干部、体育协会会员等身份),并可以根据需要变化其身份。总之,个体能够根据他在一定时期内希望达到的和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些角色中分配自己的资源投资。也就是说,个体能够试图为自己确定某些活动领域,以便既能够在其中行使他的角色,又能够使它们与组织一起运行。正是从这里,一些试图限定组织总体的结构和运行的游戏被建立起来,围绕这些游戏的一种平衡也随之形成了。

组织构成了制约,个体在组织内的行为只要是具有组织的特征,它就无法单独地展开,换言之,具有组织特征的个体行为必然是集体性的。由此看来,变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真正困难所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一些个体经过学校培训后返回到企业或机构,他们很快就恢复了或更确切地说又服从了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可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出自教育,而是由于这些企业或机构长期缺乏

结构性的变化,是它们固有的运行逻辑或曰“游戏规则”在阻碍个体对新知识运用的缘故。如果这种阻碍确实存在,那么社会学家就有理由去了解这种制约是以何种方式被实施的。其实,这个了解也正是本书自身想达到的目标,或许也是正在发展中的我国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我们在本书中将先介绍组织社会学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后阐述作为组织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工具。虽然我们认为在前面已经摆出了“组织现象”,但我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在进入正题之前,再以简单的方式对“组织现象”的初始形态作一勾勒,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读者更快地适应我们的语境。

从日常工作经验出发,我们或许都知道组织是什么。不过,我们最先会想到的可能是那些根据明确规定的目标(物质的生产、信息的传递、利润的实现)组建的团体,它们既有一系列能保证自身目标实现的手段(包括人的手段),同时又受约于强制性的控制程序。这样的团体指的是工厂或行政机构,它们对每个成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分工并有专业性分配,对每个成员的职权等级有明确规定,并要求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因必须的交往而形成的关系体系与已定的规章制度相吻合。在这个有许多形式制约的“有组织的”领域里,人们还经常会碰到来自另一种领域,即个体在其中可以行使自己自由的那个领域里的抵触。然而,这两种领域之间没有可以连续使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组织现象不是仅存在于组织自身内部的,而是更扩散更普遍的。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组织现象,组织社会学家经常列举一个伙伴群体决定搞一次活动的例子。该伙伴群体在活动的决定刚作出时,其成员因彼此比较了解而没有提出过多的问题;他们之间情投意合,对将要进行的活动内容和意义有很默契的赞同。所以,群体中的互相协调不需要通过解释就可以形成,每个人晓得自己要做的事情,也熟悉别人的角色期待。此时,人们还不能说该群体已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最多只能说它是一个由友谊关系和共同目标结合在一起的“非正式群体”。但人们可以认为组织的雏形已经存在了。其实,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个群体的成员共同分担了任务。每个成员拥有的知识、资源和促使成

功的手段必然使他们各自的贡献趋于专业化。由于他们的角色之间不是严格等同的,一定的威信等级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或一些领导权威被大家所接受,而且不言明地承担着指挥和协调小组活动的职责。然而,与此同时,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活动产生了一些约束,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小组成员的互相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形式组织所具有的轮廓基本出来了。

既然这个群体还是协调一致的,共同目标在每个成员那里是内在化的,而且或多或少是自发地使自己的行为与共同的目标相适应的,那么它的组织轮廓就是暗含的和非形式化的。不过,这种局面一般不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只要这个群体的目的和行动所基于的那些同意稍微有些紧张或冲突(更具体地说,一旦该群体的人数有所增加),那么群体要维持其原来的协调一致就会碰到困难,它的运行就不能再基于原来那个暗含的结构,它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有可能变得复杂起来。这时,该群体就会自问:怎么办?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去做?因此,群体的成员就需要解释了,在解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两种局面:或者是解散小组,宣告结束;或者小组维持下去,但维持下去的这个小组必须拿出办法,以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危机。也就是说,这个群体要在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上建立协调,而这个协调所涉及到的对象必须是那些要为实现由此构成的组织目标而尽力的人。

上述例子显示了一个形式组织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明确的角色和任务的分配;职权等级体系,其功能是保证使每个成员的行为与组织目标相符合;交往体系,它是不同成员之间互相从属关系的体现;目标准则,它们是用于评估和检查组织的成果以及在组织中竞争的个体所获得的成果。以某种方式说,这个伙伴群体经历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引起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首先,使得小组成员的行为和小组总体的前途具有可预见性;其次,在使检查已期待和已规定的成果成为可能的同时,使小组的运行得以调节;最后,建立明确的组织机构和制定一系列规定每个成员的任务及其执行办法的内部制度。由此开始,这个伙伴群体的成员才可以合法地自称是组织成员,他们的任务和办法已经变成形式化了,而且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因此,组织分析首先在于研究人

类的集体行动自身所需要的条件，并试图摸清我们中的每个人为了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必须使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达成合作时所碰到的那些制约。^①

通过这个例子，人们也许明白了组织社会学的决策分析首先属于一种个案式的定性研究，采用归纳式的推论方式，而且非常强调以实地观察组织的实际生活为自己的出发点。根据 E·巴比(E. Babbie)的观点，实地调查是展开归纳逻辑推理的用武之地，是在自然情境下直接观察社会现象的一种社会研究方法。^②

概括地说，组织社会学家关注的“田野”是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其决策分析试图发现的不是一种呆板的组织，而是组织成员战略行动的构成及其引起的反应，换言之，是致力于揭示集体行动的制约或曰有组织行动的活力来源。

^① E. Friedberg, *L'analyse sociologique des organisations*, revue POUR, №28, réd. 1973, p. 15 - 17.

^② [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11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第一章

组织的复杂化与工业化

组织的复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加强了人类社会活动对组织的依赖,使组织既是个体实施发展战略的首要条件,又是改变处境可借助的重要力量,从而推动了组织研究的进程。组织的研究发现个体有组织的行动不是消极被动的,也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计算有倾向的,换言之,个体不只有一只简单的“手”,还有一颗“心”和一个“头”。这些发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深化组织研究的必要性。

一、大工业组织的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业革命?是什么力量导致了第二次浪潮波及全球?A·托夫勒(A. Toffler)在提出这些问题后解释道:工业革命不是由技术本身的力量推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单单用经济因素同样不能说明工业化的动力,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十分复杂的可变因素。K·普拉尼(K. Polanyi)在研究了19世纪前后资本主义强国发生的一些重大转变之后指出:工业革命是一种人为的现象,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和智力革命。工业化引起的变化是涉及全社会的现象,即政治、经济、宗教、司法、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如果人们